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nd Geneva, 2012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世界投资报告

迈向新一代投资政策

TOWARDS A NEW
GENERATION OF INVESTMENT
POLICIES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nd Geneva, 201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世界投资报告

迈向新一代投资政策

TOWARDS A NEW
GENERATION OF INVESTMENT
POLICIES

WIR
2012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投资报告 2012 : 迈向新一代投资政策/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096-0568-4

I. ①世… II. ①联… III. ①对外投资—调查报告—世界—2012

IV. ①F83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6855 号

组稿编辑: 张永美

责任编辑: 张永美

责任印制: 杨国强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11 层 100038)

网 址: www.E-mp.com.cn

电 话: (010) 51915602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16

印 张: 16.75

字 数: 37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96-0568-4

定 价: 1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负责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英文版说明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投资与企业司是联合国体系内负责处理全球有关投资和企业发展问题的中心。该司在研究与政策分析以及协助政府间建立共识方面具有 35 年的国际经验与技术专长，并负责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

本报告中“国家/经济体”一词指代领土或地区。报告中使用的称谓与材料的描述并不代表联合国秘书处对任何国家、领土、城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者定界发表任何意见。此外，国家的分类仅仅为便于统计与分析，并不代表对具体某国或某地区在发展进程中所处阶段作出判断。本报告中所使用的主要国家类别沿用联合国统计处的归类。即：

发达国家：OECD 成员国（智利、墨西哥、韩国与土耳其除外），加上欧盟新加入的非 OECD 成员国（保加利亚、塞浦路斯、立陶宛、拉脱维亚、马耳他与罗马尼亚），外加安道尔、百慕大、列支敦士登、摩纳哥与圣马力诺。

转型经济体：东南欧国家与独联体。

发展中国家：泛指所有未包含在上述类别内的经济体。为统计之用，中国的数据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

UNCTAD 述及的公司与其活动，不应视作对其的认可。

本出版物中的地图所示边界和名称以及所用称谓均不代表联合国的正式认可或接受。

图表中使用了下列符号：

- 两点（..）表示数据未知或未得到单独数据。表中出现数据未知项的行均被删除。
- 破折号（—）表示数值为零或可忽略不计。
- 除另有说明，表中空白处表示该项不适用。
- 年份间有斜线（/），如 1994/95，表示一个财政年度。
- 年份间使用连接符（-），如 1994~1995，表示整个时期，包括开始年份与结束年份。
- 除另有说明，单位“元（\$）”指美元。
- 除另有说明，年增长率或变化率均为年复合率；表中数据与百分比因修约的原因，可能合计数与总计数不等。本报告所载资料尽可引用，但需注明出处。

联合国出版物

销售编号：E.12.II.D.3

ISBN 978-92-1-112843-7

Copyright © United Nations, 2012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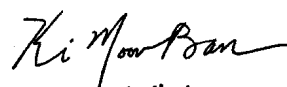
瑞士印刷

前 言

外国直接投资（FDI）前景仍充满风险与不确定。2011 年全球 FDI 流量超过危机前水平，达 1.5 万亿美元，2012 年这一复苏趋势将稳定在 1.6 万亿美元左右。尽管现金持有量达历史最高水平，但跨国公司尚未用所持现金进行持续投资，尤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仍不稳定的情况下。即便如此，全球半数 FDI 将流入发展中国家与转型经济体，表明 FDI 对国家发展（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在内）具有重要作用。

内容更广泛的发展政策已被提上议程，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将占据核心地位。这一新范式引发了特定的投资政策挑战。国内层面包括整合投资政策与发展战略、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确保投资政策的关联度与有效性。国际层面上，需拓展国际投资协定中发展的内容并管理其复杂性以及平衡东道国与投资者的权利与义务。

在此背景下，《世界投资报告 2012》推出 UNCTAD 可持续投资政策框架。在持续危机与社会和环境面临紧迫挑战的时代，鼓励对可持续发展进行投资至关重要。在展望 2015 年后的发展框架之际，我对国际投资界这一重要工具表示赞同。


潘基文
联合国秘书长

致 谢

《世界投资报告 2012》由 James Zhan（詹晓宁）领导的工作组编写。工作组成员有：Richard Bolwijn, Quentin Dupriez, Kumi Endo, Masataka Fujita, Thomas van Giffen, Michael Hanni, Joachim Karl, Guoyong Liang, Anthony Miller, Hafiz Mirza, Nicole Moussa, Shin Ohinata, Sergey Ripinsky, Astrit Sulstarova, Elisabeth Tuerk and Jörg Weber. Wolfgang Alschner, Amare Bekele, Dolores Bentolila, Anna-Lisa Brahms, Joseph Clements, Hamed El Kady, Noelia Garcia Nebra, Ariel Ivanier, Elif Karakas, Abraham Negash, Faraz Rojid, Diana Rosert, Claudia Salgado, John Sasuya, Youngjun Yoo, 实习生 Cree Jones 亦对本报告有所贡献。

《世界投资报告 2012》得益于 Lorraine Eden, Arvind Mayaram, Ted Moran, Rajneesh Narula, Karl Sauvant 与 Pierre Sauvé 的建议。

Bradley Boicourt 与 Lizanne Martinez 提供研究与数据支持, Hector Dip 与 Ganu Subramanian 为其工作提供支持。报告的制作与宣传工作由 Elisabeth Anodeau-Mareschal, Severine Excoffier, Rosalina Goyena, Natalia Meramo-Bachayani 与 Katia Vieu 负责。

Lise Lingo 编辑手稿, Laurence Duchemin 与 Teresita Ventura 负责排版。Sophie Combette 负责封面设计。

编写的各阶段, 尤其是讨论报告前期草稿的研讨会阶段, 工作组得益于下列人员的评论与建议: Masato Abe, Michael Addo, Ken-ichi Ando, Yuki Arai, Nathalie Bernasconi, Michael Bratt, Jeremy Clegg, Zachary Douglas, Roberto Echandi, 范文杰, Alejandro Faya, Stephen Gelb, Robert Howse, Christine Kaufmann, Anna Joubin-Bret, Jan Kleinheisterkamp, John Kline, Galina Kostyunina, Markus Krajewski, Padma Mallampally, Kate Miles, Peter Muchlinski, Marit Nilses, Federico Ortino, Joost Pauwelyn, Andrea Saldarriaga, Stephan Schill, Jorge Vinuales, Stephen Young 与 Zbigniew Zimny。同时, 许多 UNCTAD 同事, 如 Kiyoshi Adachi, Chantal Dupasquier, Torbjörn Fredriksson, Fiorina Mugione, Christoph Spennemann, Paul Wessendorp, Richard Kozul-Wright, 以及全球化和发展战略司与国际贸易及商品司亦对本报告作出悉心评论。

中央银行、政府机构、国际组织与非政府机构的诸多工作人员亦对本报告有所贡献。衷心感谢芬兰、挪威、瑞典与瑞士政府提供的资助。

缩 略 词

ADR	替代性纠纷解决	ASEAN	东南亚国家联盟
BIT	双边投资协定	BRIC	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金砖四国）
CIS	独立国家联合体	CSR	企业社会责任
EPF	创业政策框架	FDI	外国直接投资
FET	公平与公正待遇	FPS	充分保护与安全
FTA	自由贸易协定	GATS	服务贸易总协定
GCC	海湾合作委员会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SP	普遍优惠制	GVC	全球价值链
ICC	国际商会	ICSID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IIA	国际投资协定	IP	知识产权
IPA	投资促进机构	IPFSD	可持续发展投资政策框架
IPM	投资政策监控	IPR	投资政策审查
ISDS	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	LDC	最不发达国家
LLDC	内陆发展中国家	M&A	绿地投资与并购
MFN	最惠国待遇	MST-CIL	最低待遇标准—国际习惯法
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EM	非股权模式
NGO	非政府组织	NT	国民待遇
PPP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PR	效能要求
PRAI	负责任的农业投资原则	SD	可持续发展
SEZ	经济特区	SDT	特殊和差别待遇
SIDS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SME	中小型企业
SOE	国有企业	SPE	特殊目的实体
SWF	主权财富基金	TNC	跨国公司
TPP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TRIMs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
UNCITRAL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WIPS	世界投资前景调查

内容提要

FDI 趋势与前景

尽管世界经济出现动荡，2011 年全球 FDI 流量仍超过危机前的平均水平，达 1.5 万亿美元，但仍较 2007 年的峰值低约 23%。

UNCTAD 预计，2012 年 FDI 的增速将放缓，流量将维持在 1.6 万亿美元左右。2012 年前 5 个月，领先指标——跨国并购与绿地投资——数额下降，但基本面因素、高盈利与高现金持有促成了小幅增长。长期预测显示，全球 FDI 增势稳健，如无宏观经济冲击，2013 年将达 1.8 万亿美元，2014 年达 1.9 万亿美元。

2011 年，各主要经济体的 FDI 流入量均有增长。发达国家 FDI 流入量增长 21%，达 7480 亿美元。流入发展中国家的 FDI 增长 11%，达创纪录的 6840 亿美元。转型经济体的 FDI 增长 25%，达 920 亿美元。发展中经济体与转型经济体分别占全球 FDI 总额的 45% 和 6%。UNCTAD 预测，未来三年，这些国家都将继续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

非洲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 (LDCs) FDI 流入量已连续三年下降，但非洲的前景广阔。2011 年流向非洲的 FDI 下滑大部分是由北非的撤资潮引发的。相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 FDI 流入量已复苏，达 370 亿美元，接近其历史峰值。

主权财富基金 (SWFs) 在发展导向型投资方面具有极大潜力。SWFs 的 FDI 量仍相对较小，至 2011 年累计 FDI 约为 1250 亿美元，其中约 1/4 在发展中国家进行。SWFs 可以通过与东道国政府、开发金融机构或其他私营部门投资者合作，投资于基础设施、农业与工业发展，包括绿色增长行业的建立。

跨国公司 (TNCs) 的国际生产扩张，现金水平创历史新高，但其却未用所持现金进行投资。2011 年，TNCs 国外分支机构雇用职工约 6900 万人，销售额达 28 万亿美元，增加值达 7 万亿美元，比 2010 年增长 9% 左右。TNCs 的现金持有量达最高水平，但截至目前尚未转化为投资的持续增长。当前的现金“充裕 (Coverhang)”可能会导致将来 FDI 的激增。

UNCTAD 新的 FDI 贡献指数表明，从增加值、创造就业与工资、税收、出口与资本形成等方面考察，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的国外分支机构对东道国的贡献相对较高。该排名同时也列出了 FDI 贡献低于预期水平的国家，证实了政策因素对最大限度地发挥 FDI 的积极影响与减少其负面影响至关重要。

投资政策动向

2011 年，许多国家仍继续开放并促进各行业的外国投资以刺激经济增长。同时，新的监管与限制

性措施也进一步出台，其中含有基于产业政策的考虑。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外国投资者准入政策的调整（如农业与医药行业）；采掘业方面的调整，包括国有化与撤资条件；以及对输出 FDI 更为严格的要求。

国际投资政策不断变化。每年新增的双边投资协定（BITs）数目持续缩减，区域投资政策制定则日益加强。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投资政策制定的一大重要因素。许多有关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设想涌现，但尚未付诸实践。

供应商在遵守企业社会责任（CSR）准则方面需要支持。跨国公司的 CSR 准则对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特别是中小企业来说是一大挑战，他们必须遵守多重且零散的标准并据此进行报告。政策制定者可通过将 CSR 纳入企业发展与能力建设计划来缓解这一挑战压力并创造新的机会。同时，跨国公司可在行业层面上协调并统一标准和报告要求。

UNCTAD 可持续发展投资政策框架

鼓励投资并使其有助于可持续发展，对任何国家来说都至关重要。新一代投资政策正在出台，各国政府欲推进内容更广泛且更复杂的发展政策议程，同时构建或保持良好的投资环境。

“新一代”投资政策将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发展视为吸引投资并从中受益的核心。这在国际与国家两个层面上引发了特定的投资政策挑战。国家层面包括将投资政策与发展战略整合，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投资政策以及确保投资政策的关联度与有效性。国际层面上，需拓展国际投资协定（IIAs）中发展的内容，平衡东道国与投资者的权利与义务，以及管理 IIAs 制度的系统复杂性。

为应对这些挑战，UNCTAD 已制定了综合性的可持续发展投资政策框架（IPFSD），由以下三部分构成：①投资政策制定的核心原则；②国家投资政策指南；③设计与使用 IIAs 的政策选择。

UNCTAD 的 IPFSD 可为政策制定者制定国家投资政策以及谈判或审查 IIAs 提供参考，它为国家与国际投资政策的探讨与合作提供基础。IPFSD 以“动态文件”的形式设计，并包含一个网络版本，后者旨在建立一个互动的开放平台，邀请投资界相关人士就未来投资政策的包容性与参与式发展交流 IPFSD 相关意见、建议和经验。

概 述

FDI 趋势与前景

2012 年全球 FDI 增势放缓

尽管受 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与当前主权债务危机的持续影响，2011 年，全球 FDI 流入量仍增加了 16%，首次超过 2005~2007 年危机前的平均水平。这一增长是在本年度跨国公司取得更高的利润且发展中国家有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发生的。

由于经济再次陷入不确定状态，且主要新兴市场可能面临更低的增长率，2012 年上述有利趋势有削弱的风险。UNCTAD 预计，2012 年 FDI 的增速将放慢，FDI 流量将维持在 1.6 万亿美元左右（区间中点）。领先指标已显现出这一趋势——2012 年前 5 个月跨国并购与绿地投资数额下降。此外，并购公告数目不多亦表明未来几个月 FDI 流量将持续疲软。

中期前景：谨慎乐观

据 UNCTAD 基于宏观经济基本面因素进行的中期预测显示，FDI 流量将保持适度稳定增长，排除任何宏观经济冲击，2013 年与 2014 年分别达 1.8 万亿美元与 1.9 万亿美元。关于这一时期的经济事件，投资者的不确定性仍非常高。UNCTAD 针对跨国公司高管的投资计划进行了调

查，据《世界投资前景调查报告（WIPS）》的结果显示，对 2012 年全球投资环境持悲观态度的受访者比持乐观态度的多 10%，而数目最多的一组受访者（近半数）或保持中立或无法确定。该结果表明，中期（2012 年后）形势日渐乐观。当被问及未来 FDI 计划支出时，半数以上的受访者预计 2012~2014 年的支出水平相比 2011 年会有所增长。

所有主要经济体的 FDI 流入量均上涨

继连续三年下降后，2011 年发达国家 FDI 流量大幅回升，达 7480 亿美元，比 2010 年高出 21 个百分点，但仍较危机前 3 年的平均值低 1/4。尽管发达国家有此增长，但本年度发展中国家与转型经济体的 FDI 仍占全球总额的 1/2 以上（分别为 45%与 6%），二者总量达 7760 亿美元，增幅为 12%，创历史新高。全球 FDI 流量在经济与金融危机期间达较高水平，证明了这些国家经济的活力和对未来 FDI 流量所起的重要作用——鉴于其在 2011 年发达经济体回弹的情况下仍保有这一份额。

流向发展中国家的 FDI 提升是由亚洲 10%的增长与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 16%的增长带动的。流向转型经济体的 FDI 增长了 25%，达 920 亿美元。而对非洲的投资量仍延续了 3 年以来的下滑态势，但降幅较小。最贫困国家仍处于 FDI 的萧条期，流向最不发达国家（LDCs）的投资下降 11%，减至 150 亿美元。

迹象表明,从中期看来,发展中国家与转型经济体仍将紧跟全球 FDI 增长的速度。根据 TNC 高管对今年 WIPS 的回馈,2012~2014 年排名前 10 的计划投资目的地中有 6 个是发展中与转型经济体。其中印度尼西亚上升了 2 个名次,首次跻身前五。

2012 年,三大经济群体——发达国家、发展中与转型经济体 FDI 流入量的增势均趋于稳健。发展中地区中,非洲是值得注意的,其 FDI 流入量有望恢复。亚洲(包括东亚与东南亚、南亚以及西亚)与拉丁美洲 FDI 的增长将是温和的,幅度较小。预计 2012 年转型经济体的 FDI 流量将进一步增长,并有望在 2014 年超过 2007 年的峰值水平。

受发达经济体推动,全球 FDI 流出量攀升

2011 年发达国家的 FDI 大幅攀升,达 1.24 万亿美元,增长 25%。虽然欧盟(EU)、北美与日本三大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投资者对此均有贡献,但驱动因素各不相同。美国 FDI 的增长主要源自创纪录的再投资收益(占 FDI 流出总量的 82%)——部分受 TNCs 外国现金持有推动。欧盟 FDI 流出量的增长则来自跨国并购。日元的升值使日本跨国公司的购买力增加,导致其 FDI 流出量翻番——在北美与欧洲的并购增加了 132%。

尽管发展中国家的 FDI 流出量保持较高水平,占全球总量的 23%,但 2011 年其输出 FDI 下降了 4%,减至 3840 亿美元。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的投资额下降 17%,大部分由资金撤离造成(负的流出量)。撤离行为部分是出于金融方面的考虑,如汇率与利差等。东亚与东南亚的投资基本停滞,东亚甚至有 9% 的降幅,而西亚的输出 FDI 则大幅上涨,增至 250 亿美元。

跨国并购上升但绿地投资仍占主导

2011 年,跨国并购上涨 53%,达 5260 亿美

元。这一增长由巨额交易(交易额超过 30 亿美元)数目的增加引起(从 2010 年的 44 起升至 2011 年的 62 起)。这反映出股票市场资产价值的提高与运作买家资金实力的提升。尽管绿地投资额已连续两年下降,但 2011 年稳定在 9040 亿美元。2011 年,在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绿地投资仍占总额的 2/3 以上。

尽管 2011 年全球 FDI 流量的增长大部分是跨国并购带动的,但自金融危机以来,绿地投资项目总额仍明显高于跨国并购。

初级部门与服务业的 FDI 形势好转

由 FDI 项目数据(包含跨国并购与绿地投资)可知,初级部门、制造业与服务业三个部门的 FDI 流量均有所增长。继 2009 年与 2010 年大幅下滑后,2011 年服务业的 FDI 出现反弹,约达 5700 亿美元。初级部门的投资也扭转了前两年的下降趋势,达到 2000 亿美元。这两大部门占比略有上升,制造业比重则相对降低。总体看来,对 FDI 项目增长贡献最大的 5 个行业分别是采掘业(采矿、采石与石油开采)、化工、公用事业(电力、天然气与供水)、交通与通信以及其他服务(主要是石油与天然气领域的服务)。

主权财富基金在发展导向型投资方面具有极大潜力

相比于其管理的 5 万亿美元资产规模,SWFs 的 FDI 量仍相对较少。截至 2011 年,SWFs 的 FDI 累计约达 1250 亿美元,其中 1/4 以上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然而因其具有长期且为战略导向的投资观,SWFs 准备投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 LDCs 的生产部门。SWFs 为投资于基础设施的开发、农业生产率的提升(对许多 LDCs 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以及工业的发展(包括绿色增长行业的建立)提供足够的资金规模。为加大对这些领域的

投资, SWFs 可以同东道国政府、开发金融机构或其他能够为项目带来技术与管理能力的私营部门投资者进行合作。

跨国公司所持大规模现金仍未转化为投资

国际生产的所有主要指标均显示, 2011 年, 国外分支机构的经济活动扩张。这一年, 国外分支机构雇用员工约 6900 万, 销售收入达 28 万亿美元, 增加值为 7 万亿美元。UNCTAD 针对 100 家最大的跨国公司进行年度调查, 数据显示, 国际生产总体呈上升趋势, 公司海外销售收入与雇员人数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国内。

尽管 TNCs 的国际生产逐渐扩大, 但截至目前其创纪录的现金储备仍未转化为投资的持续增长。据 UNCTAD 估计, 包括海外留存收益在内, 跨国公司现金水平已超 5 万亿美元。100 家最大的跨国公司数据显示, 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其为持有现金而削减了生产性资产与收购 (尤其是外国收购) 方面的资本支出。2010 年单是这 100 家企业的现金持有量便达 1.03 万亿美元的高点, 其中约 1660 亿美元为新增——高出危机前平均现金持有量的部分。尽管新近数据显示 TNCs 生产性资产与收购的资本支出呈现回弹, 2011 年上升 12 个百分点, 但跨国公司持有的额外现金 (2011 年约为 1050 亿美元) 仍未得到充分配置。国际金融市场新一轮的不稳定将继续鼓励现金的持有和现金的其他使用方式 (如支付股息或降低负债水平)。然而, 随着条件的改善, 当前的现金“充裕”可能会导致未来 FDI 的激增。预计前 100 家 TNCs 有超过 5 万亿美元现金持有量, 这将带来超过 5000 亿美元的可供投资资金, 或占全球 FDI 流量的 1/3。

UNCTAD 的 FDI 吸引力与贡献指标显示, 发展中国家排名在上升

UNCTAD 的 FDI 吸引力指数衡量经济体在吸

引 FDI 方面的成效 (结合 FDI 流入总量与相对 GDP 的流入量进行考察), 今年排名前 10 的国家中有 8 个是发展中国家与转型经济体, 而 10 年前只有 4 个。2011 年, 蒙古首次跻身前列。前 10 名以外的许多国家在排名上有较大的改善, 包括加纳 (第 16 位)、莫桑比克 (第 21 位) 和尼日利亚 (第 23 位)。相比于 FDI 吸引力指数, UNCTAD 另一大指数——FDI 潜力指数显示出, 有许多发展中国家与转型经济体吸引的 FDI 比预期更多, 包括阿尔巴尼亚、柬埔寨、马达加斯加和蒙古。其他国家的 FDI 则比预期水平 (基于经济决定因素设想) 要少, 包括阿根廷、菲律宾、斯洛文尼亚和南非。

UNCTAD 的 FDI 贡献指数在《世界投资报告 2012》中首次引入, 基于 FDI 与国外分支机构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对经济体进行排名, 采纳的指标有增加值、雇员人数、工资、税收收入、出口、研发支出与资本形成 (例如国外分支机构的员工数目占该国全部正式员工人数的比重等)。这些变量是衡量 FDI 经济影响最重要的指标。根据这一指数, 2011 年 FDI 贡献最大的东道国为匈牙利, 紧随其后的是比利时与捷克共和国。UNCTAD 的 FDI 贡献指数显示出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非洲, 增加值、就业、出口以及研发支出方面, 国外分支机构对当地经济的贡献相对更高。

将 FDI 贡献指数同 FDI 存量在一国 GDP 中的比重进行比较会发现, 许多发展中国家与转型经济体“每一单位 FDI”有更大的经济发展影响, 这样的经济体包括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意大利, 再少一些的有巴西、中国和罗马尼亚。此外, 也有 FDI 低于预期水平 (与现有存量相对应) 的国家, 例如保加利亚、智利和牙买加。这种情形下许多经济体吸引到大量投资, 大部分原因在于其财政体系, 然而这些投资对国内经济并未产生相应的影响。

FDI 贡献指数是对 FDI 的经济发展贡献进行

系统性比较分析的首次尝试，有关这一领域的的数据极少。UNCTAD 将继续进行对投资影响的研究，并致力于改进指数的数据与方法。UNCTAD 准备与政策制定者就结果的解释进行合作，并帮助各国改进国家层面的数据收集。

各地区最新趋势

流入非洲的 FDI 继续下降，但前景广阔

流入非洲的 FDI 连续三年下滑，跌至 427 亿美元。但是，2011 年非洲大陆 FDI 流入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北非 FDI 的减少，特别是由于自身政治局势的长期不稳定，埃及和利比亚这两个 FDI 主要接受国也陷入停滞。相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FDI 流入量从 2010 年的 290 亿美元恢复至 2011 年的 370 亿美元，堪比 2008 年的峰值水平。南非 FDI 流入量的反弹推动了经济复苏。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相对积极的经济前景也是促成经济好转的因素之一。除采掘业 FDI 的传统模式外，中产阶级的兴起促进了银行业、零售业和通信服务业等服务领域 FDI 的增长，这在 2011 年服务业 FDI 份额的增长上有所体现。

非洲 FDI 整体下降主要是因为源自发达国家的 FDI 减少，但发展中国家相对增加了非洲大陆的输入 FDI 份额（绿地投资项目从 2010 年的 45% 增至 2011 年的 53%）。

东南亚正在追赶东亚

东亚和东南亚的发展中地区 FDI 流入量创历史新高，共计 3360 亿美元，占全球流入总量的 22%。东亚地区 FDI 流入量为 2190 亿美元，增长 9%，仍占主导地位，但东南亚地区的 FDI 流入量达 1190 亿美元，增长 26%，增速继续超越东亚地区。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的四个经济

体——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实现大幅增长。

中国的 FDI 流入量也达到了创纪录的 1240 亿美元，流向服务业的 FDI 首次超过制造业。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世界投资前景调查（WIPS），中国继续在投资者 FDI 理想目的地中位居榜首，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东南亚经济体的排名上升显著。总的来说，随着中国工资和生产成本的持续上涨，东盟国家制造业的相对竞争力正日益增强。

东亚地区的 FDI 流出量下降了 9%，跌至 1800 亿美元，而东南亚地区的 FDI 流出量则上涨了 36%，达 600 亿美元。中国 FDI 流出量下降了 5%，而中国香港则下降了 15%。相反，新加坡的 FDI 流出量同比增长 19%，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则大幅攀升。

采掘业并购的兴起推动了南亚地区的 FDI

经历了 2009~2010 年的下滑之后，南亚地区的 FDI 流入量反弹至 390 亿美元，主要是由于流入印度的 FDI 上升，这部分占该地区 FDI 流入量的 4/5 以上。采掘业的跨国并购额激增至 90 亿美元，而制造业的并购额下降了 2/3 左右，服务业的并购额则远低于 2006~2009 年的年度数据。

南亚国家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如政治风险和 FDI 障碍。为建立一个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这些问题亟待解决。然而，近期的事态发展，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关系的日益改善，凸显了新的机遇。

印度的 FDI 流出量增长了 12%，达 150 亿美元。海外绿地投资项目的增长，尤其是采掘业、金属和金属制品和商务服务业，弥补了三大产业跨国并购下降所带来的价值损失。

西亚地区的 FDI 仍受区域和全球性危机的影响

西亚地区的 FDI 流入量连续三年下降，2011

年仅为 490 亿美元。流向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国家的 FDI 仍受到大型投资项目尤其是在建项目取消的影响；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项目融资枯竭，并进一步受 2011 年该地区动荡局势的影响。非 GCC 国家 FDI 流入量的增长是不平衡的。跨境并购额 3 倍的增长促成了土耳其 FDI 的激增。政治和社会动荡的扩散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该地区其他国家 FDI 的流入。

2010 年，FDI 流出量降至五年来最低水平，其后在 2011 年回弹，主要得益于该地区投资者海外收购的回升（经过一段时间的撤资后）以及制造业海外绿地投资项目的增长。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转向产业政策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的 FDI 流入量增加了 16%，为 2170 亿美元，主要受南美洲较高流入量（增长 34%）的驱动。不计离岸金融中心，中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的流入量降低 4%，而该地区离岸金融中心的流入量下跌 4%。南美洲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高增长率和自然资源禀赋是其 FDI 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该地区的输出 FDI 呈波动态势。继 2009 年 44% 的下降与 2010 年 121% 的增长后，2011 年 FDI 流出量跌落 17%。这种波动是因为与海外生产活动投资无必然联系的 FDI 日渐重要，这点在离岸金融中心在该地区 FDI 流出总量中所占的高份额以及巴西对外投资者公司内部贷款回流增加（2011 年为 210 亿美元）的现象中得到体现。

该地区一些国家正转向更多地使用产业政策。其出台的一系列措施旨在建立生产能力和推动制造业，包括更高的关税壁垒、更严格的许可证标准并在公共采购中更倾向于国内产品。这些政策可能会导致 FDI 进入该地区并对企业的投资计划产生影响。汽车、计算机和农业机械行业的跨国

公司纷纷宣布了该地区的投资计划。投资来自两个层面：欧洲和北美的传统投资者，发展中国家和日本的跨国公司。

俄罗斯加入 WTO 有益于转型经济体的 FDI 前景

东南欧、独立国家联合体（CIS）和格鲁吉亚等转型经济体的 FDI，经两年停滞后有所回升，达 920 亿美元，大部分源自跨国并购交易。东南欧制造业 FDI 的增加受颇具竞争力的生产成本和欧盟市场的开放准入推动。独联体国家的资源型经济从持续的自然资源寻求型 FDI 中获益。俄罗斯继续占据该地区输入 FDI 的最大份额，其 FDI 流入水平达历史第三高。虽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投资者项目日渐重要，但发达国家——主要是欧盟成员国——仍然是 FDI 最重要的来源，在项目总数中比例最高（包括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

服务业在该地区输入 FDI 的占比仍然较低，但其重要性可能会随着俄罗斯联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而增强。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俄罗斯已承诺减少对诸多服务业外国投资的限制（包括银行、保险、商务服务、通信和分销）。加入 WTO 也可能增强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并改善整体投资环境。

鉴于对投资者更为友好的环境，俄罗斯联邦制定了加入 WTO 以及采掘业、公用事业、银行业和通信业的新私有化方案，UNCTAD 预计，流入转型经济体的 FDI 将进一步增长。

发达国家：2012 年放缓迹象

发达国家的 FDI 流入量在 2009 年触底，2011 年加速复苏，达 748 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21%。然而，2010 年以来的复苏仅弥补了 2008~2009 年金融危机期间损失的 1/5。流入量维持在危机前三

年平均水平（2005~2007 年）的 77%。欧洲 FDI 流入量的下降持续至 2010 年出现回升趋势，而美国则继续强劲复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吸引了大量资金，日本则连续两年面临净撤资。

发达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吸引 FDI 流入石油和天然气（特别是非传统矿物燃料）以及煤、铜和铁矿石等矿产资源。金融机构继续出售海外资产以偿还其在金融危机期间获得的国家援助，并强化资本基础以满足巴塞尔协议 III 的要求。

2012 年，欧元区危机和大多数主要经济体复苏的易受冲击性将对发达地区 FDI 的复苏形成严峻考验。并购数据表明，与 2011 年同期相比，发生在发达国家的企业跨国并购在 2012 年前 3 个月下降了 45%。绿地投资项目的发布数据显现出相同的趋势（下降 24%）。虽然 2012 年贸发会议预测北美 FDI 流入量将持平，欧洲 FDI 流入量温和增长，但这一前景仍存在相当的下行风险。

最不发达国家（LDCs）FDI 连续第三年衰退

最不发达国家中，安哥拉的外国投资者大量撤资与偿还公司内部贷款，使得流入该地区的 FDI 降至五年来最低水平，为 150 亿美元。更为重要的是，绿地投资额整体下降，FDI 大型项目仍然集中在少数资源丰富的 LDCs。

虽然服务业特别是公用事业、运输仓储和通信业的投资正在增加，但采矿、采石和石油方面的投资仍然是最不发达国家 FDI 的主要形式。虽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投资份额和金额并未恢复至 2008~2009 年的水平，但 LDCs 仍有约半数绿地投资来自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中，印度仍是 LDCs 最大的投资者，其次是中国和南非。

内陆发展中国家（LLDCs）FDI 增至创纪录的

348 亿美元。哈萨克斯坦仍是 FDI 流入的主要驱动力。得益于采掘业的大型项目，蒙古 FDI 流入量增长超过一倍。流入的 FDI 绝大多数仍是采矿、采石和石油方面的绿地投资。俄罗斯对乌兹别克斯坦的一项大规模投资导致转型经济体的投资份额激增。加上发展中经济体，2011 年这两大经济体在绿地项目中所占份额达 60%。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的 FDI 流入量连续三年下降，降至 6 年来最低水平——41 亿美元。流入 SIDS 的 FDI 依旧向税收优惠的区域倾斜，三大经济体（巴哈马、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巴巴多斯）接受了大部分 FDI。2011 年，采矿、采石和石油缺乏大型交易，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跨境并购总额大幅下降。相反，绿地投资总额创历史新高，南非成为最大的来源国。3/4 的绿地项目源自发展和转型经济体。

投资政策动向

国家政策：危机期间加强投资促进

在经济持续不确定、金融市场动荡与缓慢增长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继续开放和促进外商投资以促成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同时，继续加强对 FDI 的监管。

2011 年采取的投资政策措施普遍有利于外国投资者。较之 2010 年，限制性政策措施占比明显下降，从 32% 左右降至 22%。然而，将这一数目的减少视为之前投资环境趋向更为严苛的逆转信号，还言之过早；另一原因在于，2011 年的限制性措施将增加往年累计总量。在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体以及发达国家新出台的限制条件和监管措施比例大致等同。

投资政策总体倾向于投资自由化与投资促进，且越来越多地针对特定行业，尤其是部分服务行

业（如电力、燃气及水的供应业、运输与通信业）。若干国家推行私有化政策；其他重要措施包括外商投资准入程序的便利化等。

与往年一样，采掘业的情况是一大例外，原因在于大多数涉及该行业的政策措施都不太有利。另外两个不利政策占比相对较高的行业是农业综合业和金融服务业。

更多的国家监管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政策领域：①通过引入新的进入壁垒或强化甄别程序（如在农业与医药行业），调整输入 FDI 的准入政策；②针对采掘业制定更多监管政策，包括国有化与征用或撤资条件以及提高企业所得税率、特许使用费与合同重新谈判的成本。这两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产业政策的考虑。

2011~2012 年，很多国家对输出 FDI 采取了更为严苛的要求。国内的高失业率引发了一系列担忧，即输出 FDI 可能会致使就业输出，并削弱国内工业的基础。其他政策目标包括稳定外汇汇率和改善国际收支等。已实施的政策措施包括输出 FDI 的限制与外国投资遣返激励两方面。

国际投资协定：区域化的兴起

截至 2011 年底，国际投资协定总数达 3164 项，其中包括 2833 项双边投资协定（BITs）和 331 项“其他国际投资协定”（主要包括涵盖投资条款的自由贸易协定、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区域协定）（《世界投资报告 2012》中的 IIAs 将不再包含避免双重征税协定）。2011 年共计签署了 47 项国际投资协定（33 项双边投资协定和 14 项其他协定），与 2010 年的 69 项相比，传统投资协定仍显劣势。造成该现象的原因包括：①逐步转向区域性协定的签署；②国际投资协定变得颇具争议与政治敏感性。

就数量而言，双边协定仍占主导。然而，在经济意义上，区域协定日益重要。区域协定的经

济重要性及其影响日益增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正在进行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投资谈判；2012 年中国、日本和韩国就三边投资协定达成一致；包含墨西哥—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达成；在欧盟层面，欧盟委员会代表所有成员国进行投资协定谈判以及东盟的发展。

多数情况下，区域性协定属于自由贸易协定。通过全面覆盖国际经济活动中的贸易和投资元素，这些内容更为广泛的协定通常能更好地应对当今的经济现实——国际贸易与投资关联度日益提高（见《世界投资报告 2011》）。这种转变有利于整合和统一投资规则，表明向多边主义迈进了一步。在此框架下，新协定不会逐步取代旧条约，旧条约亦不能代替新协定，则区域化将增加协定层次而非协定的简化和统一，从而导致国际投资协定网络更加复杂并倾向于重叠和不一致。

可持续发展：日益成为共识

虽然 2011 年缔结的若干国际投资协定依然保持传统的协定模式，即将投资保护作为其唯一目标，但其他协定却有所创新。一些新的国际投资协定包含诸多特征以确保不妨碍反而利于各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后者关注投资的环境和社会影响。

近期若干其他事项也表明可持续发展日益受到重视，包括：2012 年美国修订《双边投资条约范本》；在跨大西洋经济理事会主持下，欧盟和美国发布 2012 联合声明；以及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对其双边投资协定范本所做的工作。

最后，可持续发展日益受重视也表现在其他与投资相关的国际决策中，如：2011 年《联合国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的通过和执行；贸发会议、粮农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负责的农业投资原则的执行；2011 年《经合组织跨国企业准则（1976）》的修订；2012 年《国际商会国

际投资指南（1972）》的修订；2012年贸发会议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多哈宣言》；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里约+20”峰会）的召开。

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改革：未尽议程

2011年，依据国际投资协定提交的已知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SDS）案例至少增加了46件，这是一年内已知基于条约提交的争端数目最多的一年。近期一些案例中，投资者称核心公共政策对其业务前景造成了不利影响。

一些国家已表达了对现行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SDS）的担忧，如澳大利亚的贸易政策声明宣布，未来的国际投资协定将不再包含ISDS相关条款；委内瑞拉近期发出通告称将会退出ICSID公约。这些都反映了该体系的缺陷（如仲裁庭关于国际投资协定关键条款宽泛或矛盾的解释、执法不力与程序废止，有关仲裁员资格的担忧、缺乏透明度与诉讼成本高，ISDS与东道国—东道国诉讼之间的关系）以及关于ISDS有效性和合法性更广阔的公共话语。

针对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SDS）的明显缺陷，诸多改革建议不断涌现。这些建议旨在控制投资者—东道国争端案例的数目；实现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SDS）的合法性，提高诉讼程序的透明度；调整与国际投资协定关键条款不一致以及对条约错误解释的内容；提高仲裁员素质，确保公正；缩短诉讼时间，降低诉讼成本；协助发展中国家处理ISDS案件；消除有关系统运作的担忧。

有些国家已对其国际投资协定进行了部分调整，但其他许多国家却未做改变。系统性评估个别改革方案及其可行性、潜在效益和实施方式

（如国际投资协定、仲裁规则及机构层面）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就ISDS进行多边政策对话有助于在改革的首选进程和实施方式方面达成共识。

供应商在遵守企业社会责任（CSR）准则方面需要支持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供应链中企业社会责任（CSR）准则迅速扩张，涉及单个跨国公司和产业两个层面。此现象极为普遍，许多行业的跨国公司建立了供应商行为准则以细化其全球供应链的社会和环境绩效标准。此外，企业社会责任准则和标准及其实施也日益复杂。

全球供应链中的CSR准则能够促进东道国的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为解决关键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转移知识，并为达到这些标准的国内供应商提供新的商业机会。然而，遵守这些准则也给很多供应商带来了相当大的挑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型企业（SMEs）。挑战包括：使用超出现行规则的国际标准，接受东道国的市场通用惯例；不同的跨国公司存在分歧有时甚至相互冲突的要求；供应商在日常运营中适用国际标准、应对复杂的报告要求及多个现场视察方面的能力有限；消费者和公民社会的顾虑；完全遵守CSR标准的中小型企业相对不完全履行的企业有竞争力方面的担忧。

迎接这些挑战需要提高企业家才能和管理技能。各国政府以及跨国公司可通过构建企业家精神和能力建设方案以及强化国家促进遵守劳工和环境有关法律的现有机构等措施，来帮助国内供应商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政策制定者还可以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协调行业标准，简化合规程序，以支持国内供应商的发展。